

罗哲文(1924-2012)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学家、文物保护专家，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工作。作为当代中国文物事业发展的见证人和亲历者，罗哲文先生为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

为我国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研究制定、古建筑的保护理论和实践、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长城保护、世界遗产申报与保护、文物保护人才培养等工作贡献了智慧与学识，对其后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产生了深远影响。

# 回望罗哲文

袁荔 顾芸培



20世纪80年代开始，历史学家单士元(右)、城市规划专家郑孝燮(中)和文物保护专家罗哲文(左)3位全国政协委员，被称为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三驾马车”。(图片由作者提供)

## 城市中的有形和无形遗产 在快速文化遗产业化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城市形态和内涵，包括一些构成要素和功能需求等，都会发生新的变化；但是人与财富等资源的聚集程度总体来说是在不断提高，不仅古今荟萃，而且物品交换、内涵更新和人员流动等也越来越快，功能与意义不断拓展，很多财富已不完全是为了生活与管理等日常行为之需，更多是为了交换交流，包括传播人类文明的信息与价值观念，塑造社会的意识形态——因此，城市中的有形和无形遗产在快速文化遗产业化，将一些城市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即意味着人们对于城市遗产的文化自觉，意味着要在保存、传承、弘扬基础上支撑城市继续创新发展。这正是博物馆作为重要手段和工具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

## “博物馆之城”不仅意味着在一个城市里建设更多的博物馆……

博物馆不仅收藏、保存人类遗产，而且也越来越重视以真、美、善的形式与符合时代要求的价值导向，来对各类遗产进行保存、诠释、展示、传播，组织其人的交互体验等。博物馆不仅重视传统的可移动文物的收藏保管和展览，也越来越重视和社区、所在地及周边环境的整合兼容以及整体视觉与认同形象的经营。社区、生态、户外博物馆等已经成为博物馆大家庭中的新类型。因此，在经济社会转型和城市升级过程中，国内外都有一些遗产资源富集的城市明确提出建设博物馆之城的目标，自然有其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合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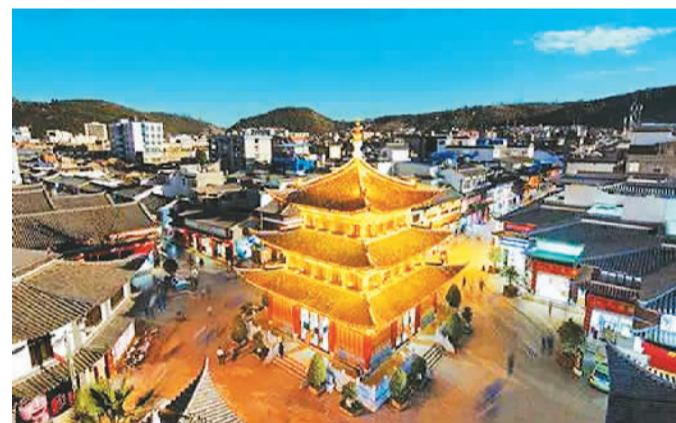
改革开放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博物馆虽然经历了快速发展，但仅从人均数量来看，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更为重要的是，博物馆之城不仅是在一个城市里建设更多的博物馆，而且要把提升博物馆质量、完善博物馆体系摆到更高的位置，使博物馆结构合理、布局完善、运行良好，从而实现和城市生活、生产等更普遍而紧密的关联。这样的城市，自然也应该包括博物馆建筑之外的城市其他视觉资源，尤其是文化遗产资源的博物馆化处理与管理。如此才能真正算得上名副其实的博物馆之城。

这一点，其实和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利用及可持续发展需求是相契合的。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国内已有20余座城市出台了建设博物馆之城的目标或规划，一些城市已经启动实践并取得了初步成效。而最应该向博物馆之城方向努力的，首先是那些历史文化名城。

# 历史文化名城 应率先成为 博物馆之城

曹兵武



2021年新晋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云南省通海县景色。(图片来源：云南日报)

## 探索在社会空间里构建 涵盖古今未来的物人关系

历史文化名城遗产资源丰富，可移动文物当然应以各类博物馆为最佳归宿并规划适当的博物馆体系；历史文化名城往往古建筑多，古建筑本身就是现成的视觉文化符号，然而有些建筑的传统功能已经消失，需要进行新功能探索，博物馆也往往是较好选择，博物馆化的古建筑，正可以实现里里外外的保护、诠释和展示；还有历史文化名城集中连片分布的历史街区、名胜景区等，往往需要整体性保护和展示诠释，可以将一座博物馆作为其窗口或其中的点睛之作，和其整体风貌融为一体，并提升公众对其认知和欣赏。

历史文化名城日常生活生产中积淀的文化素质非常丰厚，包括非遗等，都可以和社区博物馆、生态博物馆、非遗馆等结合起来开展保护传承工作。此外，历史文化名城往往旅游需求比较旺盛，外来游客较多，当然也可以据此为其提供更多品类的博物馆文化供给和服务，比如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结合博物馆之城建设规划自然、科技、科学、艺术、美术类的现代博物馆等，将其作为发挥现代城市提高公众素质、发展城市文化产业的抓手。

城市的发展一方面隔开了人与物尤其是自然之物的距离，另一方面也在集成性空间里富集了更多不同类型的物与人，因此，建设博物馆之城，不仅是简单的建设更多的博物馆，而应是文化遗产、资源和城市形象整体性的视觉规划与管理以及价值提升和呈现关联，以探索在新的社会空间里构建涵盖古今未来的新型合理的物人关系。遗产的博物馆化既意味着包括具体而丰富的内容，也应该有从整体到细节的合理定位、提升、呈现和管理运行，以期实现继承中的创新发展以及文化、经济和社会等效益的最大化。(作者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自1982年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制度启动以来，国务院已经先后公布了136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一些省市也公布了自己的历史文化名城。这些名城因历史文化遗产而得名，各种遗产资源自然相对而言非常丰富，包括整体格局、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历史遗迹等等，并常有大量相关可移动文物和无形文化遗产散存各处。尽管人们以普遍意识到其重要性，但它们在快速发展的现代城市建设中有时会被当成包袱，常常面临损毁消失的危险。

延伸阅读

## 罗哲文与佛光寺

今天，我们回望文物保护事业薪火相传的历史，不得不提到佛光寺。作为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古建筑，佛光寺的学术研究史不仅经历了战乱洗礼，也将梁思成、罗哲文两位建筑史学大家与更多后继的学者们联系在一起。

1937年7月，营造学社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纪玉堂一行人来到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当时，梁思成对板门的年代提出了疑问：“其造门之制，为现存实例所未见……内部结构恐为明以后物，其结构法是否按原形，则待考也。”

就在当年的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动荡的时局使得四人没能在佛光寺做更多停留。在战火纷飞中，这座“古建第一瑰宝”的存亡一直牵动着梁思成的思绪。27年后的1964年7月，罗哲文

和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孟繁兴一起前往佛光寺，被雨水阻于寺内数日，于是对东大殿进行了更为仔细的观察。这场意料之外的甘霖，却给佛光寺的研究带来了重要的新发现。

### 他们又发现了什么——

证明唐代始建原物的题记

在这次考察中，罗哲文在板门背后发现了大量题记：“题记的位置在大殿大门的背后和大门门颊(即门框立柱)之上，均系墨笔题的。由于字迹不整齐，加之千余年来的灰尘蒙盖，很难识别。他和孟繁兴同志借手电筒和马灯的光线寻找，经过3天的工夫，终于找出了唐咸通七年、咸通八年、乾符五年各一处，五代天祐十八年二处，同光三年一处，金天德五年、泰和四年各一处，未题年月的唐、五代、金以及明、清题记数十处。”

这些题记中以唐咸通七年(公元867年)为最



左图：罗哲文发现的唐咸通七年(公元867年)题记。

右图：佛光寺东大殿东壁壁画局部。



(图片来源：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 罗哲文对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贡献

罗哲文一生都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并在许多领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 参与国家保护政策的制定

新中国成立后，罗哲文进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工作，随后为全国文物摸底调查提供了具体而详细的普查方法，为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保护文物古迹打下了基础。20世纪60年代，他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文物保护法规的制定，起草了《文物保护单位暂行条例》初稿，参与审定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工作，指导全国各地文物部门做好“四有”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面对古建筑遭受自然与人为破坏，他著文呼吁保护古建筑的积极意义，希望加大对文物建筑保护重要性的宣传力度。罗哲文结合当时实际情况所撰写的古建筑保护文章，不仅在当时对中国文物古建筑保护事业具有某种关键性的指导意义，有些已成为中国文物古建筑保护事业的纲领性文件和指导原则。

### 文物保护理论与实践并行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罗哲文参与、组织和审定了一系列重大的古建筑维修工程，如勘察维修雁北文物、

保护北海团城、迁建清音阁、修缮赵州桥、搬迁永乐宫等。20世纪90年代后，他以专家身份，通过策划、考察、评审的方式为长江三峡文物保护工程、西藏文物保护三大工程、长城保护、山西南部早期木结构建筑保护工程、汶川地震文物抢救工程等全国重大的文物保护工程提供指导。

罗哲文在大量实践工作中取得了宝贵经验，并积极将研究成果公之于众，逐渐成为文物建筑保护、修缮和研究等领域的中坚力量。他在70余年的文保工作实践中努力寻找中国古建筑保护与修缮的内在规律和措施方法，探讨东方木结构建筑保护的独特性，逐渐形成了他的“中国特色古建筑保护维修理论与实践”思想。

### 推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在单士元、侯仁之、郑孝燮、罗哲文等先生的积极推动下，1981年12月28日，“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被正式提出。1982年2月我国公布了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单。在继承梁思成关于北京城整体建设规划思想的同时，罗哲文在具体工作实践中不断发展、充实和完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内涵与理论。他逐次提出名城保护“三个阶段论”、中国特色的名城保护体系、历史文化名城“四有”(有形、有神、有声、有韵)等理论，形成名

城发展观精准的价值定位。

### 保护长城与推动创建长城学

在梁思成夫妇的嘱托下，自1947年起罗哲文便开始对长城进行勘察、研究、保护与修复。他致力于史料及实地勘测的理论研究，撰写了大量有关长城的论述、论文、调查报告、诗词、随笔和序跋，编写了中国第一部长城专著《万里长城居庸关·八达岭》，并在2003年以79岁高龄穿越罗布泊，亲身考证“新疆境内也有长城，汉长城由玉门关西延至盐泽(罗布泊)地区”的论断。

作为新中国最早勘察、保护和研究长城的著名学者，罗哲文率先提出长城学的概念，并从科学性质和社会功能两方面，对长城的兴建和止建、建筑及功用等进行深入研究。他建立了中国长城学会并对各地长城研究组织给予大力支持，使长城学在创建之初迅速成为一门显学，为从事长城学研究的后学者拓展了更加广阔深入的领域，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人”。

### 倡议加入“世界遗产公约”

1985年，侯仁之、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4位先生提出政协提案，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5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开启世界遗产的申报和保护之路。

罗哲文亲自参与中国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对申报项目亲自把关。在申遗过程中，他强调形成中国特色遗

产观，主张保护和利用并举，提出科学定位申遗的建言，对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在申报世界遗产中出现盲动性的症结——将申报世界遗产单纯当作拉动地方旅游经济收入的手段进行批判。在推动大运河申遗过程中，他始终认为保护比申遗更为重要，遗产保护不能背离群众利益，在体现运河文化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让运河两岸的人们生活得更好才是申遗的终极目标。

### 培养文物古建和各领域人才

梁思成先生对学生无微不至的爱护和对文保事业信念的传承也深刻地影响了罗哲文，这位见证了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从无到有的古建筑泰斗也曾坦言“想方设法帮助年轻人多学点东西”。除将毕生学识都用到对文物古建的保护与研究上之外，他也将培养文物古建保护人才为己任。每到一地考察，他毫不吝惜地将自己的知识和实践经验传授给相关工作者；借学术交流 and 考察之机，在国外传播学术思想和教授营造技艺，将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建筑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文化部副部长孙家正曾评价道：“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能有今天的成就，除国家昌盛政通人和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一批能人志士为之鼓舞奔走，罗哲文便是其中之一。”

作者单位：  
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清源文化遗产团队

## 文化遗产保护 呼唤更多“罗哲文”

齐欣

“鸣鹤拂其羽，戴胜降于桑”。2006年谷雨时节，我是和罗哲文先生一起在大运河上度过的。从2005年冬季到2006年的5月，是罗老无数忙碌中又一段值得反复回望的时光。以他为纽带，联合郑孝燮先生、朱炳仁先生，推动了全社会关注“京杭大运河申遗”。罗老具备许多老一辈文博大家的优秀品格；但令我惊讶的，还是他年逾八旬仍活跃在一线，甚至活跃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前沿。

从20世纪80年代的文保“三驾马车”到为文化遗产保护奔走的“运河三老”，我们可以从中发现：罗老彼时越来越多的日常，其实是在“鼓吹”和“游说”。源于强烈的传承责任感，他也逐步形成了朴素的文化遗产传播观：坚持“真实、完整”的文化遗产理念；尽可能多地联合相关资源——哪怕是在自身行业之外并不擅长的领域；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在四处奔走。也

正因为此，老人去各地，都会遇到来自各个行业的拥趸。我们当今社会中之所以没有出现更多的“罗哲文”，就是因为他身上闪现出的“真实”“公共”“实践”特性，表面看毫不稀奇，但能做到三者兼备的人，还是太少了。

从“运河三老”至今，又过去了15年。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已经从引进、遵循世界遗产理念，演化至形成全新保护格局；世界遗产更加“文化化”，价值阐释逐步社会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了。于是，在社会多元环境中，让更多人认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成为日益紧迫的挑战——虽然这一过程仍然漫长，但已不能再被视为“可以慢慢来”，以时间换空间的自然演进。

今天，文化遗产保护呼唤更多“罗哲文”。

(作者为本报高级编辑 曾任罗哲文专家助手)



2006年春，“运河三老”请缨前往运河沿岸节点城市，为即将到来大规模全国政协大运河申遗考察活动打前站。这是郑孝燮(左一)、罗哲文(中)、朱炳仁(右)在扬州考察。(图片由作者提供)

(图片由作者提供)